

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

指导教师：缪 钺（四川大学） 撰者：方北辰

在芜湖至南京间，长江的流向大体是从南往北。因此，秦代开始称自此以下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为“江东”。魏晋南朝时期，江东地区曾经出现一批著名的家族。这些家族长期繁衍延续，人口众盛，世代为官，具有雄厚的地方势力。由于他们兼有“世家”与“大族”的特征，故本文名之为“江东世家大族”。

江东世家大族是史学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首先，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当权的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学术诸方面，门阀士族都产生过显著的作用，为治史者所注意。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有侨姓、吴姓、郡姓和虏姓等类型，其中之吴姓门阀正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化身。因此，全面研究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次，南方经济大发展的起点是在东汉，至隋唐达到高峰；而江东又是南方经济发展之精华所在。植根于此的江东世家大族，其萌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恰好与江东地区经济发展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相对应，这决非偶然现象。深入追寻江东世家大族的兴衰与江东经济发展之关系，不仅有助于门阀形成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江东经济发展史的研究。第三，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光辉夺目的时代，当时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

的文化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即有不少人出自江东世家大族。他们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文化领域中，都曾有积极的贡献。系统地阐论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动，无疑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第四，江东世家大族中的一些家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吴县顾氏、陆氏，武康沈氏，自东汉至于近代，历时近两千年犹有著名人物出现。所以研究江东世家大族，对于家族史的研究亦有积极意义。最后，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是现今我国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经济文化区，此项研究还可为当前制定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远景发展规划，提供更完整的历史背景资料。

不过，迄今为止，国内外史学界对江东世家大族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国内对此课题作专门研究者，单行之专著尚未有问世者，即期刊所载之论文亦寥寥无几。至于国外的研究情况，据个人闻见所及，似比国内更为寂寞。有鉴于此，笔者决定对此课题作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一、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

本文所论的江东世家大族包括以下十九个家族：吴郡吴县顾、陆、朱、张氏，钱唐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谢、贺、丁氏；吴兴郡武康沈、姚氏，乌程丘氏；义兴郡阳羨周、许氏；丹阳郡秣陵纪、陶氏，句容葛氏。

对文献资料加以分析，上述家族的渊源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其自述的先世状况来看，他们大都不是江东的土著，而是从北方南迁者。第二，他们南迁之后在江东的安居地，集中在今苏南平原、浙北平原和宁镇丘陵的建业附近，这是当时江东经济、文化、交通最发达的区域。第三，他们南迁江东以及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时间，大多是在东汉。

东汉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的初始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

动中，他们的集团特征虽然还不突出，影响亦不太显著，然而他们在各种政治环境中磨炼成熟，这就为日后孙吴在江东立国创造了政治上的先决条件。

孙吴是他们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策起兵攻占江东之后的数年间，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孙氏政权未能与江东世家大族建立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关系。及至孙权继兄统事之后，他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才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方告实现。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体说来，在孙吴前期（孙权建元黄武之前），孙氏皇权、江北地主和江东世家大族三大政治势力之间，能够保持团结和睦的关系，因而孙吴的国势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进入孙吴中期（自孙权建元黄武至孙权死）之后，由于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孙权力图强化君权，于是废黜张温、吕壹校事、“二宫构争”等政治斗争相继爆发。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的加剧，使孙吴的国势由盛变衰。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已难挽回，孙吴终于灭亡。

两晋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起伏时期。西晋灭吴之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开始转入低潮。虽然以后西晋王朝对他们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摆脱“亡国之余”的困境。西晋末年，北方出现社会大动乱，江东世家大族接连发动了三次旨在维持江东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武装行动，并且最后下定决心与司马睿政权合作。这一正确的抉择，对此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东晋政权在江东建立起来，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才能保持大体安定的局面，从东汉开始的南方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势头才得以继续而不致

中断，到隋唐时期长江流域才得以变成与黄河流域相颉颃的经济文化基地。不过，江东世族与东晋政权的合作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司马睿初到江东之时，江东世家大族对之相当冷淡。经过王导着意争取，他们才与司马睿政权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关系。其后，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渐多，司马睿政权亦在江东站住足跟，江东世家大族也就开始受到排挤。在王敦之乱中，江东世家大族以种种方式发泄了内心的不满和愤懑。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睿政权被迫重新分配政治利益，让江东世家大族分享一部分重要政治权力。经过这种调整，南北世家大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出现缓和，并且比较稳定地保持到东晋末年。自此开始，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遂转入相对平静的阶段。

南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宋、齐二朝，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军功家族，这些军功家族对当时的政局有重大影响。孙恩、卢循起事之后，侨姓高门在寒门将帅势力的冲击之下，逐渐丧失了长期把持的军事权力。江东世家大族则不然。他们在刘裕势力崛起之际，审时度势，积极走军功道路，于是一批军功家族应运而生。他们对于刘宋王朝的建立和“元嘉之治”的实现起了比较重要的促成作用。南齐政权建立之后，这批军功家族因一直忠于刘宋王朝而受到冷遇。由于失去军事权力的凭借，他们由武复归于文。梁、陈二朝，江东世家大族中对当时政治有重大影响者，主要是一些出自较低门第的权幸。这些权幸的政治活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而且对当时的政治主要起了恶劣的影响。他们的出现，是江东世家大族趋于衰落的标志。南朝灭亡后，江东世家大族虽然还具有比较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居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性集团，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关于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以往大多数论者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世家大族乃是反动政治的

代表，毫无积极作用可言。这种看法是偏激的，与历史实际并不符合。就江东世家大族而论，他们的政治活动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大体说来，自东汉末到刘宋王朝的二百余年间，他们作为江东地区实力强大的地方政治集团，一直致力于维持江东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北方军事势力（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拥有的军事势力）的入侵，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种政治行动，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效果上却保障了南方社会发展的上升趋势而不致中断，在此基础上才有隋唐高峰时期的出现。因此，全面衡量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我们认为其积极作用是大于消极作用的。

二、经济地理环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兴衰

在江东世家大族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江东地区的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因素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江东地区的自然地形，按现今的地理命名，包括以下八个部分：苏南平原、浙北平原、宁镇丘陵、皖南丘陵、浙西丘陵、浙东丘陵、金衢盆地和浙南山地。由于地理形貌、土壤质量、水利资源、交通联系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的差异，再加上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以上八个自然地形小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很不一致的。如果按经济上得到有效开发并达到较高生产水平的时间早晚来衡量，又可分为三大类经济发展区。第一类是经济先进区，包括苏南平原和浙北平原，面积只有江东总面积五分之一左右。此类经济区在先秦时期即开始开发，到东汉时即已接近全国先进水平。第二类是经济继起区，包括宁镇丘陵、皖南丘陵、浙西丘陵和浙东丘陵，面积约占江东总面积五分之二。此类经济区的开发到西汉时才缓慢起步，一直要到南朝后期才开始接近第一类经济区的发展水平。第三类是经济落后区，包括金衢盆地和浙南山地。此类经济区的开发迟至孙吴时才全面开始，至唐中期追及第一、二

类经济区的发展水平。总的来看，从先秦到唐末，江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各类经济区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又从严重的不平衡趋于大体的平衡。而江东世家大族的兴起衰落，正和这种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江东世家大族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汉为萌生阶段，孙吴为成长阶段，东晋为形成阶段。在东汉时期，江东第一类经济区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全国先进地区的水平，于是一批在政治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家族（包括江东世家大族）开始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其余广大的第二、三类经济区，除了个别地方外，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却依然相当低下，因而在政治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家族很少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属于江东所有家族享有的政治权利，通过察举和征辟制度分配之后，实际上却被经济先进区的少数家族所占有。江东世家大族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地理环境中萌生的。孙吴时期，江东世家大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从而得以顺利进入成长阶段。这种巨大经济力量主要是通过领兵复客制度获得的。领兵复客制度的出现，是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标志。当时，中原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亦普遍强化，因为东汉末年的长期大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江东的情况则与中原完全不同。自东汉以至孙吴建国，江东并未发生社会大变乱，其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严重衰退，而且一直保持向上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其根源即在于当时各类经济区之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过大，因而经济先进区的少数家族，得以利用武力掠取经济落后区的山越居民以为私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现象就产生了。由此可见，江东世家大族的成长，亦与江东的经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东晋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形成阶段。形成的标志则是他们与侨姓世家大族共同构筑了门阀政治。然东晋门阀政治的能够建立，其主要原因亦在于这时第二、三类经济区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还不高，在政治上能够与吴姓与侨姓相竞争的家族还不多。

江东世家大族之所以出现衰落，主要是因为他们得以兴起的经济地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衰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南朝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在此阶段中，江东第二、三类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大批在政治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寒门家族开始崛起。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跻身政治，冲击门阀政治的沟垒，并且最后形成了寒门皇族、寒门将帅、寒门权幸等政治势力。于是，门阀士族控制的权力被严重削弱，门阀政治开始发生质变。江东世家大族最先觉察到这种社会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将会产生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一再提出检实户籍、保存东晋黄籍和严格区别士庶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又顺应这种变化，开始走军功和权幸之途，所以他们在南朝还能对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隋唐是江东世家大族渐益衰落的阶段。南朝灭亡之后，江东世家大族仍然保有比较雄厚的家族势力，如果经济地理环境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仍可如东汉时那样保持地方大族的优势地位。但是，唐中期之后，江东各类经济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差距已经大为缩小，一批又一批在政治上具有竞争能力的新兴家族不断涌现出来；同时，推荐性选官制度又早已被考试性选官制度代替，地方势力在政治权利分配中所起的影响受到严重限制，因而江东世家大族连地方大族的地位亦不能保持，终于完全沦落为普通家族。

三、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动

东汉六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在文化方面曾经有过广泛而积极的活动。仅就《隋书·经籍志》所载资料统计，此一时期他们的著作约有三百部，总计卷数约四千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份量的百分之五左右。而《隋书·经籍志》尚未能将其

著述搜罗无遗。执此一端，亦可对他们文化活动之积极有一个大略的印象。

江东世家大族最有成就的文化活动领域，是经学和声韵、文字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图书聚藏等。在这些领域中，他们著述宏富，名人辈出。

从单一平淡发展到丰富多采，这是他们文化活动的总体趋势。具体来说，又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文化活动涉及的范围在不断拓展；其次，他们在文化活动中的创新精神亦在不断增强。经历了初始、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之后，他们的文化活动终于达到了丰富多采的境界，而高度的文化学术修养，也就成为他们的突出特征。

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总体趋势，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使他们逐渐有足够的精力与财力去从事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其二在于他们能够与侨姓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友好相处，加强合作，互相补益。这一点最为重要，然而以往论者却罕有提及。自永嘉丧乱，中原高门纷纷南渡，南北世家大族开始密切接触。此后，他们在政治上常要发生权力争夺，在经济上亦存在着利害冲突，唯独在文化上却能保持一种友好共处的关系。因此，江东世家大族可以迅速学习和吸收侨姓带来的中原学术文化，江东地区又形成了一个宽松、开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

江东世家大族广泛而积极的文化活动，无论对他们自身的兴衰，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演进，都曾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种文化活动具有巩固和延续他们政治地位的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东晋以降，由于他们已经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世代传袭的稳定优势，所以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对经济基础兴趣下降的现象。换言之，这时江东世家大族的显著标志，主要已在高度的文化而不在雄厚的经济。如果我们再机械

地以占有土地与产业的多少来判断当时某一家族是否是世家大族，或者认为当时的世家大族都是大土地所有者，这就不免有刻舟求剑的意味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生活，还对中国古代史的演进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很值得重视，但是以往亦罕有人致意于此。概括说来，这种积极影响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直接促成了东晋南朝文化重心的南移。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化重心南移，对汉文化的保存和延续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宏观现象。西汉时全国学风最盛者为山东齐鲁地区。东汉时期，黄河以南的洛阳、南阳和豫州一带，又取代齐鲁成为全国学风最盛之地。总之，两汉时全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及至东晋南朝，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中原，全国文化重心遂开始转移到长江流域的江东地区。关于江东世家大族在文化重心南移过程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分阶段来考察。在孙吴和西晋时期，他们已经通过自身的文化活动，为文化重心的南移作了必要的准备。作为江东地区最早出现的文化人物群，他们一方面在江东开创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又和中原文化发生了事先的联系和接触，为日后文化重心的南移清除了障碍。在东晋南朝时期，他们又直接参加了南方文化的创造，促成了文化重心南移的实现。第二，为隋唐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众所周知，隋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期。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来自江左。这一精辟的论断也是隋唐文化渊源的说明。而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成就，正是当时江左文化的主要成分。诸如在律体诗、绘画、书法、经学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为隋唐文化所提供的营养。第三，从此带动了江东地区重视人文的风气。明清时期江、浙、皖南人文之盛，在全国罕有其匹，不仅文化名人大量涌现，而且与文化相关的事业亦远较他省为繁荣。然而如要追溯其“颍流所始”，则不能不承认是江东世家大族开其先风。事实上，明

清时江浙著名文化人物中的一部分，如顾宪成兄弟、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顾广圻、沈钦韩、沈垚等，还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后裔，这更直接证明了江东人文之风与他们的渊源关系。

四、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

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主要有两个层次。首先，若干同姓家庭通过血缘关系构成家族；其次，各异姓家族再通过其他种种社会关系构成集团。

两汉时期北方家庭形态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即几代合居共财的大家庭日益瓦解。与此相反，东汉、孙吴之时，在江东世家大族中却存在着维持大家庭存在的迹象，而且家族内部各支系之间的关系亦相当亲密。因此，东汉、孙吴时期的江东世家大族，在家族这一层次上形成了比较坚实的块状结构。及至两晋、南朝，在严峻的客观环境影响之下，北方原本趋于松弛的家族关系，重新又变得紧密起来。然而与此又正好相反，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江东地区的家族关系开始出现分化离析的趋势，江东世家大族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南朝，他们当中三代以上合居通财的大家庭日益减少，家族内部各支系之间的关系亦日趋淡薄。在这种情况下，江东世家大族在家族这一层次上的集团结构，亦随之发生瓦解。

江东世家大族各异姓家族之间，通过同乡、婚姻、同学、师生、僚属等关系联结起来。其中作用显著者，乃是同乡与婚姻两种关系。从史载资料来看，这两种关系的联结作用，在孙吴和东晋时比较强固，到南朝即大为减弱。

总之，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自东汉到孙吴是比较坚实的时期，南朝则是渐益瓦解的时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则是江东地区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

集团结构的变化对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影响很大。自东汉到刘宋，他们的政治活动显示出较强的集团性，例如在政治上

有明确的共同目标，即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能够采取一致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又都有重要人物起领导作用等，这都与其集团结构比较坚实直接相关。到了南朝，特别是南朝后期，他们的集团结构逐渐瓦解，因而其政治活动的盲目性上升，个人色彩变浓，集团政治功能减退。事实上，集团结构的松弛瓦解，乃是江东世家大族走向衰落的内部原因。

总之，江东世家大族是一个由世代簪缨家族构成的地区性政治集团。这一集团萌生于东汉，成长于孙吴，形成于东晋，在南朝由盛转衰，到唐中期之后方告完全衰落。

从本质上说，江东地区少数世代簪缨家族的出现，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利分配上的不均等现象。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江东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在此阶段中，面积狭小的经济先进区，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全国先进地区的水平。于是，一批在政治上颇有竞争能力的家族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其余广大的经济落后区，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却十分低下，因而难以出现具有政治竞争能力的家族。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属于江东所有家族享有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却被经济先进区的少数家族所垄断。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最终导致政治权利分配上的不均等，江东世家大族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形成的。

我们也不否认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对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作用。但是就江东世家大族的形成而论，这种作用并未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从时间上看，这种作用主要只显现于孙吴时期。其次，孙吴时期江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根源亦在于当时各类经济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过大。也就是说，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本身亦是江东社会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不象一些论者所言是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终极原因。总之，在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力方面的因素，

而不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

对于江东世家大族的历史作用，我们亦应给以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平心而论，他们是一个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的社会集团。他们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他们曾为南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他们长期努力保持本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这在客观上为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六朝是江东地区社会发展较快的时代。江东世家大族是这种发展的历史产物；而他们出现之后，又反过来对其母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历史系

稀见本《峰山志》

山东境内邹县东南有一座峰山。峰山，又名邹山。《书·禹贡》：“峰阳孤桐”、《诗·鲁颂·閟宫》：“保有凫、峰”的峰，皆指此。秦始皇二十八年巡行各地，途中登峰山立的第一个刻石，命李斯用篆书写的颂扬其废分封立郡县功绩的《峰山碑》即在此。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新修《峰山志》是同治三年峰山老人候文龄据滕邑龙印麓先生峰山纪略，峰阳斋越千先生峰山宝记编次，全书分七卷，分订四册，该书为楷书手抄本，系国内罕见的线装书。书内记载了峰山的亭台、观庵、殿、堂、岩洞等风景名胜近二百处，对历史名人孔子、孟子、秦始皇、刘邦、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赵孟頫、郑板桥等登临峰山的历史事件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并将所留诗文墨迹全部收录在内。有“平峰山寇”、“避难峰山”、“避乱祭山文”等篇文章。

《峰山志》收录了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与峰山有关的大量珍贵资料。由于收录文献年代久远，资料丰富，《峰山志》不仅是峰山探幽访胜的向导，也是研究历史的珍贵文献，并可与其他历史典籍互考以证历史问题的真伪。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述，是研究农民起义史的珍贵史料。《峰山志》收录了齐鲁古国的一部分历史，亦可供研究齐鲁古代文化史之参考。

• 韩崇岚 •